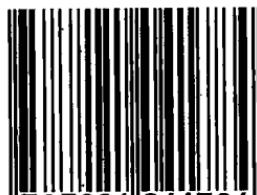


王阳明与贵州

主编 王晓昕
副主编 何静梧
李友学
高 艳

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 7-221-04178-4



9 787221 041784 >

王阳明与贵州

主编 王晓昕

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发行

装帧 张 彪

印刷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本 850×1168mm 1/32

字数 286 千字

印张 11.5

版次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书号 ISBN 7-221-04178-4

本书顾问 常 征 张 健 吴志刚 王选才
吴雁南 史继忠 王尊华

主 编 王晓昕

副 主 编 何静梧 李友学 高 艳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晓昕 王路平 邓治和 刘培元
李友学 李梦骅 何静梧 张清河
张建建 郭长智 郭华玲 高 艳

深入开展对王阳明学说的研究 (代序)

吴志刚

我市对王阳明学说的研究并非自今日始。但是,应当说,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王学的研究,那是“贵阳王阳明研究会”成立之后的事。研究会自1994年12月成立以来,团结、组织贵阳的专家、学者,以王阳明在贵州的活动及影响为重点,对他的学术思想、文化成就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先后举行过两次学术讨论会,并与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这本论著就是研究会成立一年多来所取得的一项初步的,但也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浙江余姚人,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元月),终年五十七岁。他二十八岁中进士,先后担任过知县、刑部主事、吏部主事、左金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等职,死后封新建伯。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的学说,即阳明心学,集我国古代心学之大成,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产物。它不仅在当时成为冲破传统观念束缚,与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相对立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而且影响后世,波及海外,尤其是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地,至今仍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王阳明心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者互相沟通,合为一体,形成了他的心学体系。所谓“心即理”,即把“吾心”视作宇宙万物的来源。他认为“心”是宇宙的“天

渊”，万物的“主宰”，“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谬误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冲破传统观念的重重禁锢，动摇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呼唤发挥人的主体精神，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他的“知行合一”，主要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讲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主张“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反对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它也包含着认识论方面知与行的统一。他反对“知先行后”的观点，反对把知与行割裂开来，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功夫本不可离。”他既反对“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结果只能是“冥行妄作”的人；也反对“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结果只能是“揣摸影响”的人。他说：“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确很有针对性，在我国认识发展史上，对于研究、解决知行关系问题也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是他理想人格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目标。他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何谓“良知”，他说：“良知者，心之本体”，“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也就是说，他认为“良知”就是人的天赋的至善的道德意识。这种观点也是建立在把“吾心”视作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基础之上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认为“良知”人人皆有，“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主张以“良知”而不是以“四书”、“五经”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强调道德修养的“体认”与“践履”的统一，肯定主体道德意识的能动作用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阳明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教育，几十年里，不论身居何地，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都积极创办书院，主持讲学，传播知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通过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古代教育事业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也是以他的心

学为指导的。他强调重视教育，“人皆可以为尧舜”，“务在兴起圣贤之学”；强调教育要以养成学生的道德为主，“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主张按照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反对对学生“句读课仿，责其检束”，“鞭鞑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学生“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修正以安百姓”，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等等。这些都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

王阳明与贵州有不解之缘。明正德三年（1508年）春，他被贬谪来到贵州，任龙场驿（今贵阳市修文县）驿丞，正德五年（1510年）春，离开贵州赴江西任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在贵州前后实际只有两年。时间虽短，但贵州之对王阳明，和王阳明之对贵州，都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是在贵州，经过“龙场之大悟”，“始悟格物致知”之后而形成的；他在修文创办龙岗书院，在贵阳主讲文明书院，“始论知行合一”，开新一代学风，培育众多弟子，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从维护明朝的统治出发，注意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特别是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关系，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他在贵州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包括《古文观止》收录的著名的《象祠记》和《瘗旅文》，等等。正因为如此，在修文、在贵阳，从明嘉靖年间开始，即为之立祠，以资纪念。修文的“阳明洞”、贵阳的“阳明祠”名闻海内外。在贵阳“阳明祠”内还竖有日本东宫侍讲文学博士三岛毅于清末题写的诗碑：“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表达了海内外人士对王阳明的景仰之情。

王阳明的学说，以及他在贵州的活动，有着历史的价值和重要的影响。我们应当深入进行研究，正确予以评价。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王阳明的学说多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王阳明的学说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也不能走入另一极端，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甚至把它作为改造世界的指南。对待王学，我们应当

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深入研究，客观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使之为我们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同时，通过对王学的研究，架起一座学术的桥梁，促进海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华，统一祖国作出贡献。

目 录

深入开展对王阳明学说的研究(代序).....	吴志刚(1)
第一章 龙场悟道	(1)
一、龙场悟道:阳明“批判时期”的出发点.....	(2)
二、“龙场悟道”与“知行合一”.....	(14)
三、王阳明“龙场悟道”今论.....	(23)
四、论王阳明“龙场悟道”.....	(33)
五、从理想人格的追求到“龙场悟道”.....	(43)
六、龙场悟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	(55)
第二章 著作考略	(63)
一、《阳明先生集要》黔南重刊述略.....	(64)
二、王阳明在贵阳的一篇佚文:《詹母越氏墓志铭》	(71)
三、读《象祠记》.....	(77)
四、严正其义 曲折其笔 ——读王阳明几篇关于贵州水西安氏 的书信和文章	(82)
五、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 ——析王阳明的鄙陋观	(90)
第三章 诗歌述评	(95)
一、王阳明的龙场田园诗.....	(96)

二、王阳明居黔田园诗与黔中农业	(111)
三、亦生亦友助新学 ——读王阳明居黔诗中有关诸生的诗篇	(117)
四、王阳明在黔东兴隆卫的诗文考索	(127)
五、王阳明在贵州大事与诗文提要	(131)
第四章 遗迹觅踪	(136)
一、王阳明谪黔踪迹考略	(137)
二、贵阳阳明祠的文化内涵及景观特色	(150)
三、贵阳阳明祠修建考	(155)
四、王阳明与贵州明代书院	(162)
五、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	(172)
第五章 阳明与黔人	(180)
一、王阳明与贵州少数民族	(181)
二、王阳明的民族观及其意义	(187)
三、王阳明谪黔三题	(193)
四、王阳明的贵州弟子	(196)
第六章 “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199)
一、良知教的存在论架构与文化生命的运化	(200)
二、王阳明的忧患意识与“知行合一”	(218)
三、略论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特点	(228)
第七章 阳明心学	(236)
一、王阳明心学与“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237)
二、阳明心学致用浅识	(244)

三、论王阳明哲学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影响	(251)
四、论王守仁的哲学思想	(260)
第八章 教育思想	(271)
一、王阳明的教育方法刍议	(272)
二、王阳明教育学说浅识	(284)
三、王阳明教育思想之我见	(292)
四、论王阳明教育思想的启蒙意义	(297)
五、王阳明与社会教育	(306)
第九章 文治武功	(313)
一、从哲学、政治、军事多方面认识王阳明全人	(314)
二、王阳明军事思想初探	(324)
三、试析王阳明的家教思想	(337)
附录一 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大事记.....	(347)
附录二 贵阳王阳明研究会章程.....	(355)
附录三 贵阳王阳明研究会负责人员名单.....	(359)

第一章 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阳明“批判时期”的出发点
“龙场悟道”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龙场悟道”今论
论王阳明“龙场悟道”
从理想人格的追求到“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

一、龙场悟道：阳明“批判时期”的出发点

王晓昕

龙场悟道，实现了阳明思想发展历程质的飞跃。之前，可谓阳明思想发展的“前批判时期”；至此，开始了阳明思想发展“批判时期”之历程。

(一)

“前批判时期”，正如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所回顾的：

守仁蚤岁业举，溺志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①

阳明先是“溺于词章之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欲于其中探求真理、寻觅成就圣人之道。这时期他不时地“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且常听人“讲析经义”，“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但阳明决不是那种读死书、死读书之人，他一生文治武功，把“知行合一”之旨亲履毕生，确是与历史上一般儒者大不同之处。阳明仿佛与生即俱有一种但求学必践行、知行并举的稟性，这在他很年轻时就表现出来。他学了朱子格物之习，就定要亲身体验一番才肯相信。《年谱》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

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②

然而阳明格竹七天，不想“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反而病倒了。

弘治五年，阳明 21 岁，因“格竹七天，终无所获”，其思想发展进入对程朱理学的怀疑阶段。正如他自己检讨的，这一时期“苦于众说之纷挠疲尔，茫无可入。”真理竟在何处？“圣学”如何求得？青年的阳明竟一时间“因求诸老、释”，居然还“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

然而不久，阳明又感受到佛老之道“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于是“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思想的发展可谓再度步入怀疑与彷徨。曾有人把阳明“前批判时期”的探索过程称之为“三变”，其实经由“龙场一悟”，阳明思想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所谓“第三变”，已不再属于“前批判时期”。准确地讲，两度由信奉到怀疑，是“前批判时期”阳明思想发展的实际路线。

(二)

带着第二次怀疑，阳明来到了龙场。加之贬谪之苦楚，居危且处困，阳明一度意志消沉，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他抛开一切荣辱杂念，但留生死一念尚存，久而久之，想到若果圣人处于此等境遇，该有何思何想？于是有了龙场大悟。而龙场一悟，所悟者何？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年谱记载阳明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故“格物致知之旨”乃从此悟出无疑；至于“知行合一”之教与“致良知”之教是否皆由此悟而出呢？其实答案应当是肯定的。阳明通过龙场之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既然不可如朱熹那样求理于事物，那么，理当不外乎于吾心。这正如他后来总结的：

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③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④

这里，“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之教义，皆为龙场一悟所得无疑。悟得“知行合一”之教义。次年传于贵阳文明书院；悟得“致良知”之教义，13年后传于江西南昌。悟道与传道，固然是不同的概念，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着差距，也是很自然的事。将其所悟，形成一个能够表达的概念体系，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加工凝炼之过程。就阳明思想的发展而言，“悟道”是质的飞跃，由悟道到传道则是量的积累过程。龙场一悟，开始了阳明心学体系的构建，揭开了阳明“批判时期”的帷幕。

(三)

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孟子、荀子时，儒学成为显学；汉武帝时，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儒学更是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后经魏晋之何晏、王弼，到唐初之韩愈，以至于宋明之程、朱、陆、王，“古往今来的儒家学派与学者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俱道尧舜，皆宗孔圣，咸崇五经，然而取舍不同、理解各异，纷纷表现出自己的个性，……。”（牟钟鉴：《孔子与儒学的基本问题》）古往今来的儒家学派与学者又纷纷“自谓正统儒学”，自称正传之“道统”，自恃真正之“圣门”。阳明的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讲，不能排除其于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意识形态之归属，它是千年浩瀚流变之儒学运化过程中之一脉，然又是其中最显个性特色和极富批判精神之一论。

龙场一悟，阳明思想的发展进入“批判时期”，他的整个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在“批判时期”得以阐发的。他借助悟得“孔门正法眼藏”的旗帜，把批判锋芒直指自南宋理宗以来被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打破程朱理学独尊局面，解放被禁锢已久的人们的思想的作用。阳明的心学体系具有明显的二元论性质（另文专述），这就决定了他对程朱理学的批

判，必然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方面，他从右面批判朱熹，嫌他的唯心主义不彻底；另一方面，他对朱熹一派大搞烦琐哲学，死抱经书字句不放，支离决裂，脱离实际，以教条束缚人而不令鞠行的一套十分反感。他在龙场一悟中忽叹“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也！”阳明大声呼号：“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指出虚妄空谈之教条主义乃是天下大乱之根源。若要“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孔子删述六经，已经是不得而已。而朱熹等后儒大搞“我注六经”，每每虚文繁节，愈增愈多，越添越乱，实与圣学之道大悖。阳明指出：“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⑨到了宋儒，则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局面的出现，阳明认为，纯粹是出于功利之目的，“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⑩由此看来，阳明反对繁琐与教条的目的，乃是要“存天理、灭人欲”、“破心中贼”以拯救世风日下的晚期封建社会之危机。他主张“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因此圣学之所以被扭曲，实在是功利主义作祟。他说：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倡，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⑪

看来，要破除“功利之见”靠佛老之说和程朱一类群儒之论，都是无济于事的。相反，程朱一类群儒之论，正是由于其“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才给“功利之习”的“愈趋愈下”开了方便之门，“圣人之

学”安能不“日远日晦”呢？在阳明看来，要匡扶“圣学”，只有靠他的批判的哲学体系了。

贯穿于阳明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有三个基本概念：“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四）

阳明对朱学的批判，是从对“格物”一词的训释开始的，而后引导出“心即是理”的基本命题。朱熹发现《大学》中“传”的一部分对所谓三原则和八条目的逐一解释，惟独缺少对“致知在格物”、“诚其意在致知”的论证，且“正心在诚意”一条的解释于顺序上也不符，于是判定为“阙文”和“错简”所致，乃作《大学章句·补格物致知传》正之。阳明则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辑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⑧这种批判，无疑从根本上颠覆了朱熹立论的基础。于是阳明在龙场彻悟之后，开始力图把他对格物的解释引入心学的体系。他认为，“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那么，其结论必然是把格物穷理由外在事物引向主体自身，引向人的主观世界，而不是从什么事事物物中去寻求真理。阳明牢牢抓住这一点。他仿佛在说：“注意你自己，把你的目光从你的周围收回来，回到你的内心，这是哲学对它的学徒所做的第一个要求。哲学所要谈的，不是在你外面的东西，而只是你自己。”^⑨因为，“格”就是“正”义，“物”就是“意之所在”义。“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⑩这样，他把格物说成是正心，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而心本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正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这样，当把“格物穷理”这个道德命题引入心学体系时，便蒸馏出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并进而凝结成了“心即是理”的基本哲